

从人民币升值的“虚拟性” 谈贸易发展战略和增长方式的调整与转变

——兼论政策、体制和结构因素的影响

刘光溪 徐 凯 高 洁

摘 要:人民币目前巨大的升值压力具有很高的“虚拟性”,即存在严重的“升值泡沫”。这种虚拟性根源于政策、体制等因素背离经济基本面,即观念滞后和政策体制因素的过度干预扭曲了市场机理和竞争法则,造成了粗放型贸易畸形增长和粗浅加工产业外资的大量流入,形成表面上外汇严重供大于求,国际收支双顺差与外汇储备急剧增加,对形成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压力的虚拟性有很强的放大效应。因此,要调整贸易发展战略与增长方式,转变出口比进口好、可贸易品生产越多越好、进口高技术产品比进口初级产品好等观念和做法。建议以结构调整为主线推进贸易增长方式转变,坚定不移地推行以内需为基点的促进经济发展的强国战略,创造公平的市场准入环境,从外汇供求源头着手,完善外汇管理体制,集中精力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的市场机理。

关键词:人民币升值;虚拟性;贸易发展战略;贸易增长方式

中图分类号: F8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894(2005)03-0001-10

人民币近几年面临源自国际社会的升值压力,其大的积极方面的原因是中国经济连续数年的高速增长,准确地讲是外向型经济的持续单向发展,而直接的导火线是美元进入贬值周期和中国对主要大国存在持续巨额贸易顺差,其深层原因则是全球产业结构调整与转移远快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与转移,进而透视出观念滞后和政策、体制因素的过度干预,扭曲了市场机理和竞争法则,造成了粗放型贸易畸形增长和粗浅加工产业外资的大量流入,致使表面上外汇严重供大于求,双顺差与外汇储备急剧增加。

按一般的经济发展规律,相对于中国一个低收入落后的发展中大国和现阶段的经济基本面来讲,如果政策(涉外政策法规包括贸易、外汇、外资)、体制、结构和外向型经济发展等几方面有较好的衔接协调,本币币值不应该存在严重低估或所谓升值压力,人民币持续升值不存在经济基本面的支持。正是由于政策、体制因素所造成的粗放型贸易增长和外资偏好以及外汇供求关系的严重扭曲,直接导致了人民币强烈的升值预期与巨大的升值压力,当然投机性因素和对人民币汇率长期走势的非理性判断对此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

决非正常的市场经济发展规律使然。这说明人民币升值压力具有很高的“虚拟性”，也即存在严重的“升值泡沫”。国际收支双顺差和外汇储备只不过是一个“晴雨表”，至于为什么天晴下雨，关键要分析其背后的因素。

一、人民币升值预期与升值压力的原因性质分析

1. 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导火索：美元贬值与中美贸易逆差 现行人民币汇率制度是以银行结售汇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央行设定一定的汇率浮动范围，并通过调控市场保持汇率稳定。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为防止危机扩散，维护我国和亚洲的经济金融稳定，我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并相应收窄汇率浮动区间，将汇率基本稳定在8.28元人民币兑1美元的水平，客观上造成自1998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对美元汇率波幅有限，已异化为单一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与美元贬值趋势几乎同步并举。这不是一种政策性的制度安排，只是阶段性的现实结果。

特别是自2002年以来，美元兑欧元、日元等世界主要货币的汇率都有较大幅度的下跌，这就使得人民币跟随美元如影随形地贬值，人民币汇率随之成为国际关注的中心。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特别是受美元贬值影响较大的日本和欧盟，联合起来利用各种双边和多边场合，甚至动用与汇率制度不相干的WTO，来不断要求人民币升值，造成世界范围内人民币升值压力陡然加剧。今年2月5日在伦敦召开的七国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有关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以及近来美国国会议员拟提出“限中国6个月内改变现行汇率制度”的议案等行动，又引发了新一轮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压力。从国际金融与汇率体制的演变历史来看，对一种尚不能完全兑换和自由流动的非国际储备货币来说，这是十分罕见的现象。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非兑换货币能够同时成为各国财经官员公开讨论的焦点。

另外，我国的出口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市场依赖程度很高。虽然自1991年我国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以来，对美、日、欧盟和中国香港四大传统市场出口所占比重已由1991年的77.4%下降到2003年的68.6%，对发展中国家等新兴市场的出口比重从23%提高到32%，但是我国出口对四大传统市场依赖程度依然很高，特别是对美国市场出口的份额上升到21.1%，加上经香港转口部分，接近40%。2001年，我国出口的玩具娃娃占美国该类产品进口总额的88%，鞋类占64%，软面箱包、手提包占51%，窗式空调占34%。尤应值得注意的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和地区在继80年代中后期把劳动密集型生产线转移至中国后，又把大量高新技术产品的低端组装线转移到中国来，致使我国成为这些国家和地区高新技术制成品进入美欧市场的一个“弹跳板”，进而加剧了我国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巨额贸易逆差，而同时对美存在巨额顺差的结构性不平衡。2003年我国对美国的顺差按照美方统计为1240亿美元，按我国统计也有586亿美元之巨，2004年更是分别高达1620亿和803亿美元。巨额顺差已成为引发中美贸易摩擦和一些发达国家与国际金融组织要求人民币升值的重要借口。

2. 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主观原因：贸易上“奖出限入”，资金上“宽进严出”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就成文和不成文地确立了贸易上“奖出限入”、资金上“宽进严出”的涉外经济政策，出发点就是奖励出口、限制进口，鼓励外资流入、限制资本流出。其目的一是通过出口创汇换回国内不能生产的产品和技术；二是引进经济发展

急需的资金。25年来,在这种思想和政策的指导之下,我国的贸易和招商引资取得了较大成绩。我们不仅已经习惯地将贸易、投资和消费作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把引进外资的多少作为衡量政府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而且这一习惯已经逐步演变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和根植于思想深处的天然观念。为此,我们制订了一系列鼓励和奖励措施,实施的结果自然是出现了经常项下的长期贸易顺差和近年来出现的巨大的资金净流入。虽然这几年我国对这些鼓励措施进行了较大力度的适应性调整,但要从思想和观念上改变人们几十年来已经形成的习惯尚需时日,思想与思维惯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会成为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主观原因。

3. 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客观原因: 双顺差与外汇储备急剧增加 2004年,我国新增外汇储备达2 067亿美元,减去全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606.3亿美元和贸易顺差319.8亿美元后(但服务贸易逆差为120亿美元),尚剩余1 140.9亿美元。尽管不能简单地将这1 000多亿美元归为投机资本,但其数额与人民币升值预期则是正相关的。在升值预期作用下,一是个人纷纷将手中闲置外汇卖给国家;二是企业出口预收货款和进口延期付款,甚至不购汇,使用自有外汇或外汇贷款对外支付,并提前收回境外外汇资金卖给银行,由此多结汇和少购汇;三是非官方渠道流入的资金增加,这表明我国外汇储备构成近年来发生了较大变化。过去我国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资金外流,从1989~2001年,中国通过非官方渠道移往境外的资金,按国际收支平衡表“净误差及遗漏”账项统计,高达1 360亿美元,但自2002年起,资金流动发生了逆转,当年通过非官方流入的资金为77.9亿,首次出现正值。2004年,估计经非官方渠道流入的资金高达300亿。虽然这些未被政府追踪到的神秘资金流入可能并不完全是投机资金,但确也说明了人民币升值预期对资金流入的巨大吸引力。这些短期资金一方面赌人民币升值,同时又赚取人民币与外币的利差。短期资金大量流入,外汇供大于求,是国内银行间外汇同业市场出现人民币升值压力的重要原因。在储蓄资金富裕的同时,大量外资持续流入,说明我国在某种程度上并没有利用好外资而是被外资利用。

在外汇供过于求的情况下,为了稳定钉住美元的人民币汇率,央行一方面是要在市场上大量收购外汇,这必然导致以外汇占款基础货币投放过快,从而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为抑制货币扩张,央行不得不大规模发行票据(2003年和2004年两年累计央行票据余额近1万亿元,而国债发行20多年,其存量也只有2万多亿元),频繁进行公开市场对冲操作。但随着票据发行数量的增加与期限的延长,其成本也不断增加,钉住汇率成本加大。另一方面,当央行吸纳外汇余地变小时,就会鼓励个人持有,而这需要将人民币利率压到就于美元利率并足以抵消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但是低利率既会损害央行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效果,又会打压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目前,从市场供求状况来看,虽然央行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为人民币升值减压的举措,如放宽外汇流出限制、提高账户限额、便利企业持汇、加强外汇流入特别是结汇监管等,但这些“严进宽出”的做法,并未能有效缓解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的势头。再加上人民币利率高于同期美元利率,既加剧了外汇游资进入中国,也使人民币升值预期依然持续强劲。

4. 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政策体制性原因: “重集中储备、轻分流使用”的管理体系造成外汇供大于求的尖锐矛盾 我国目前所实施的经常项下贸易结售汇和资本项下部分可兑换的外汇管理制度,其运行结果则是“重集中储备、轻分流使用”。这种制度实际上就是贸易上“奖出限入”、资金上“宽进严出”思想观念的具体化,也有担心人民币贬值的因素在

内。贸易强制性结售汇制度的实施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出口企业和个人外汇留存,抑制了外汇需求,资本项下的人民币部分可兑换和交易与兑换环节上诸多管制,更是直接限制了外汇需求和有效使用,这些政策体制因素的联合作用,人为地造成外汇供大于求,使人民币汇率价格难以反映出市场实际供求。从汇率稳定的角度看,强制性结售汇和资本流出严格控制的制度可以防止人民币贬值,但在我国外汇储备连年持续增加和人民币升值预期加大的情况下,却进一步加剧了外汇供大于求的尖锐矛盾,实际上是强化了升值压力的虚拟性,导致了外汇储备持续的被动增长。

另外,我国长期以来鼓励出口和利用外资的政策导向,也使我国树立了资金上“宽进严出”的监管理念,从而形成了以“管流出为主”的核销制度,资金流入管理方面则存在缺陷,这使得企业有相当的自由度来决定自己的收付汇行为,贸易融资“鱼龙混杂”,为外资的流入提供了通道。资金流入管理方面的监管缺失直接催生了1999年至2000年的小额顺差和从2000年至今的持续大额顺差,形成了结售汇顺差远大于贸易顺差的趋势,这也是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的主要政策性原因之一。

5. 人民币升值压力的直接原因: 贸易品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劳动力价格刚性 按外向型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和开放,国际竞争使其贸易品出口部门(如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引起工资上涨,在充分就业与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使非贸易品部门(如建筑等服务业)的工资也得到相应提高,从而提高非贸易品的价格。而贸易出口部门受制于国际竞争,产品价格难以相应提高,只能靠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消化工资上涨的压力。这样,非贸易品与贸易品的比价将持续上升,即实际汇率升值,这时的名义汇率应该升值,否则会导致通货膨胀(这就是国际经济学上的“B—S效应”)。

但是,由于中国贸易品部门的劳动力价格存在严重刚性(有些沿海地区的外向型企业的工资甚至出现10年不变的现象),再有丰富的廉价劳动力无限供应,在有些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出现大幅提高的同时(有些企业劳动生产率并未真正提高,仅靠低劳动力价格的投入来维持),很难形成工资上涨压力,也就谈不上向非贸易品部门传导了。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劳动力价格刚性的共同作用,足以使贸易品部门长期维持所谓“物美价廉”的低价格竞争优势。这说明中国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具备汇率持续上升的基本面支撑。目前,美、欧、日等主要大国也正好利用了中国大量物美价廉商品的出口、持续的贸易顺差、人民币低估三者之间似是而非的关系,制造国际舆论,凸现人民币升值对解决全球经济失衡的重大意义,以便转移其国内大众对双赤字、美元贬值、产业外包、政治难题等因素所形成的注意力。

所以说,目前人民币升值压力的直接原因就是,由于国内可贸易品生产率大幅提高而同时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和劳动力价格刚性共同导致可贸易品价格的下降。日本、德国以及很多东亚经济体的经验表明,如果一个国家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提升很快,这个国家的出口竞争力与进口替代能力也会提升很快,这些变化反映在外汇市场上(如果没有政策因素的影响)就是外汇供给的趋势性上升和外汇需求的趋势性减少,汇率会伴随经济增长面临较长时期的升值压力。中国目前面临的表面情况大致与以上国家快速经济增长时期的情况相类似,虽然中国的原创技术少,但“后发优势”的存在使国内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在过去十几年里出现了迅速提高。这一点不仅得到了经验研究的支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也看到了这些变化：中国制造业对外出口的产品越来越多，能够替代进口的产品也越来越多。可贸易品生产率的提高与其成本的降低共同导致我国可贸易品价格相对于其他国家类似产品而言价格不断下降，而且这种价格下跌具有一定的自我强化效应，即“生产率提高—出口价格下跌—出口增加—生产扩大—生产率再提高—出口价格再下跌”。加之廉价劳动力优势的过度宣传所形成的强大社会舆论，更加剧了这一自我强化效应，“量增价减”趋势似难以短时间回头。出口的惊人增长和进口的相对减缓，自然加大贸易顺差，直接产生人民币升值压力。

二、人民币升值的“虚拟性”根源于政策体制性因素

结合以上对人民币升值原因性质的简要分析，不难发现，虽说国民经济获得了较快增长，但因一定程度上“有增长而无发展”和“增产不增收”（国民总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差额以及库存扩大）因素的作用，以及体制僵化而造成产业结构调整缓慢、城乡差距拉大、地区不平衡加剧、国企改革徘徊、要素市场机制不畅、经济过于铺张以及行政区划分治的条块经济等等，致使那些与片面的政绩观相关联的产业发展因政府投资主导处于过热，而那些与百姓日常消费生活密切相关和事关国计民生的、生产投资周期比较长的产业发展则处于过冷状态。“中国经济不怕市场规律带来的热，怕的是政策与体制干预造成的冷”。无论从消费物价走势（扣除资源品和食品价格的驱动）、消费储蓄比例、过高的外贸依存度，还是结构性生产过剩和制成品库存增加以及全社会就业状况来看，中国经济远未走出通货紧缩和内需不足的阶段。正如开篇所言，基于这一经济基本面的人民币面临的压力，应是贬值而不是升值；而从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低加工、低技术、低附加值、低劳动力成本 and 低质量——“五低”产品出口的惊人增长，“量增价减”与贸易条件持续恶化，出口导向产业梯度转移停滞，外贸依存度空前提高（由2003年61%上升到2004年的75%），双顺差的持续性以及对主要大国的巨额贸易顺差等方面来看，人民币面临的又是升值而非贬值。对这一悖论稍加理性盘点，并鉴于以上升值压力各种原因性质的分析，不难发现人民币升值压力具有很强的“虚拟性”。这一虚拟性的背后就是政策和体制性因素的过大、过多干预，扭曲了市场机理，抑制了市场竞争规律的调节作用。所以说要从结构调整入手来转变增长方式，维护国际收支平衡，一切取决于基于市场规律的竞争调节机制的形成。人民币升值压力根源于政策、体制因素和背离经济基本面的虚拟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贸易上“奖出限入”，资金上“宽进严出”的思想观念造成了人为的出口高增长、外资高流入 我们很少考量卖出去的是什么？又换回来了什么？引进来了什么？又发挥了什么作用？用国内市场到底换回来了什么？“走出去”战略仅仅停留在“纸上谈兵”的战略阶段，再加上国内重点行业如能源、交通、通信、矿产、金融、流通、文化、教育等部门的投资准入限制，致使有限的民营资本只得涌入轻工、纺织、机械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生产过剩的结果只能是低价外销。这种指导思想下的涉外经济高速增长的光环反而掩盖了国内体制改革、结构调整、城乡统筹、国民教育素质提高以及社保体系构建等方面滞后的主要矛盾。如果涉外经济部门与国内经济部门多一些联动，多一些衔接，多一些融合，如果对外开放速度与国内体制改革步伐多一些协调、配套，那么外汇供应过大、需求过小的矛盾自然会多一些缓解。

2. 基于“集中有限财力办大事情”的企业强制性结售汇体制,造成外汇供给过大而需求过小,因而才有这样高的国际收支持续顺差,人为造成人民币升值压力 如果从供应上采取意愿结汇,藏汇于民,从需求上放松限制,提高用汇自主权和拓宽外汇投资渠道,让需求充分释放出来,我国未必会有这样高的国际收支顺差。所以说,仅根据国际收支顺差不能真正判断人民币币值是否被低估。

3. 基于“大力招商引资,利用外资为基本国策”的外资偏好情结而形成的外资、外企受优待,内资、内企受冷落的一系列不同层次的超国民待遇的政策法规 致使外资的市场占领、资金挤出效应放大,产业联动、结构调整、技术溢出效应缩小,利用外资的数量、速度和项目个数的政绩效应远远大于外资的质量、效益、本地化的效应。外资企业(包括银行)资本金结汇、该汇出未汇出利润、境外融资举债、关联企业内部资金运作等无疑加大了资本金项下的资金净流入。再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与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制度的试点开放不同步,“走出去”战略只有雷声而无多少雨点,越发加剧了资金流入出的不平衡,强化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4. 居民个人结汇与用汇自由度的不对称,管理上“重公轻私” 造成居民个人资本项下结汇容易,购汇难,再者升值预期、本外币正向利差的作用和个人资本项下的用汇自主权的限制,导致个人持汇意愿下降,进一步加剧了外汇供应过大、需求过小的矛盾,人为提升了人民币升值压力的虚拟性。

5. 廉价劳动力、低劳工权利标准和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贸易增长 大大降低了贸易产业和出口导向企业对相关产业、企业以及周边地区的“涓流传导效应”,从结构上加剧了人民币升值压力的虚拟性。我们不妨比较一下,GDP增长、出口增长、税收增长以及各类生产投资品和食品价格等各项指标均在迅速提升,唯独劳动力价格徘徊不前,这说明中国贸易拉动国民经济增长并赚回的大量美元外汇是在以牺牲劳动力本身的利益——工资、素质的提高和工作与生活环境的改善为代价的。个中的原因有因劳动力要素不可流动性和不可转移性致使劳动力价格难以相应地提高,但根本的原因是政策体制因素所致,特别是在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领域对廉价劳动力优势的垂青和过度宣传,似乎我国唯一的比较优势就是低素质、低价格、低要求的劳动力。这也说明中国出口的大量物美价廉的产品渗透着多少劳工阶层的血汗,其中所付出的生活和生命的代价,为出口创汇而不是创效益所形成的非账面损失和福利外流,以及失保、医保和社保的巨额欠账,得需要多大的外汇来予以弥补。

此外,出口导向产业部门特别是那些所谓不计资源成本、原材料成本、劳动力成本和环保成本及社会成本的情况下,进行的粗放外延式出口增长,不仅造成了巨大的外部不经济,而且造成在没有“成本效益”约束下亏本出口,低价竞销。如果把高投入、高消耗和高污染等造成的直接与间接损失纳入核算,我们又得消耗掉多少外汇储备。所以说,现有巨额外汇储备的背后是欠了许多账的,以此来判断人民币是否升值是不符合经济基本面的。尤应指出的是,廉价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低偿使用以及低成本资源环境消耗与污染等,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创造与进步,进而抑制了自行研发、自主产权、自创品牌、自控营销等核心竞争力的培育。

6. 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不够灵活,缺少弹性 表现在汇率变化幅度的限制过于严格,难以反映外汇市场的供求,也不能很好地发挥对外汇供求的调节作用。汇率是外汇的

价格,由外汇供求来决定,同时又反过来通过对涉外经济活动的影响而对外汇供求产生影响。正是因汇率变化幅度的过分限制,调节汇率的市场机制作用就难以得到发挥,从而凸现了人民币升值压力的虚拟性。

三、粗放型贸易增长突现了人民币升值的“虚拟性”

我们必须历史地、客观地认识我国长期以来的贸易粗放增长。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的体制环境、区域条件、劳动力素质、基础设施、技术水平以及国际分工既有格局等因素的作用,我国出口贸易增长方式也只能是粗放式的。实际上出口导向型政策并非事先设计出来的,而是伴随我国开放的扩大、外资的大量流入和加工贸易取代一般贸易成为主导等外向型经济的深入发展而自发、客观地形成的,这种以加工贸易和外资企业为主导的粗放型贸易增长对迅速改变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状况,积累发展资金,推动我国经济整体跃上新台阶,结束长期困扰中国人的短缺经济,其贡献是巨大的,说明开放经济比封闭经济更具有活力,本文立题决无消极否定之意。但是我们不能不认识到的是,近10年来这种粗放型贸易获得了惊人的增长,引起了国内乃至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什么“中国威胁”论,“出口紧缩”论和“出口冲击”论等一时甚嚣尘上,成为引发人民币升值压力的直接因素。虽然近几年来,中国贸易顺差对国际收支顺差和外汇储备增加的作用呈大幅下降趋势(但越来越多的短期资金流入是通过经常账户交易项目完成的),资本顺差已成为主要因素,但粗放型贸易增长对国际市场和国内经济发展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却越来越明显,对形成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压力的虚拟性却具有很强的放大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加剧和突显了这一人民币升值的虚拟性。粗放型贸易增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我国出口产品以粗浅加工贸易为主,我们所认定的所谓高技术产品出口主要是由外资企业提供的 从贸易总量上来看,外商投资企业是我国扩大出口的主力军,目前已占到贸易总额的55%。2003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中,外资企业占85.5%、加工贸易占90%,IT类产品出口占96.2%。在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中,外资企业增加值的比重高达68%左右。这说明虽然近几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比重提高很快,但这只是反映了我国抓住了新一轮以IT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低利润和低端的生产制造环节大规模向我国转移的机会,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仍然主要依靠外资企业及加工贸易,主要依靠吸纳IT产业的转移,本土企业还明显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缺少自有品牌。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IIE)的中国问题专家Nicholas Lardy认为,今天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外国公司低成本的制造基地而已。中国的高科技制造业既没有很高的科技含量,本土化也比较低。2002年,中国出口总额中有680亿美元(20%)被归类为“高技术产品”,但这些“高技术出口产品”多为部件或利润很低的消费类电子产品,例如激光打印机和DVD。更重要的是,高技术产品出口中有61%来自外商独资企业,这表明生产过程中没有发生向当地伙伴的技术转移。中国的高技术产品加工出口的当地增值率仅为16%,而加工贸易出口的平均当地增值率也只有35%。中国主要的竞争优势在于其所拥有的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水平的劳动力成本和第二世界水平的基础设施的独特组合,但这可能跟高技术沾不上边。当这一外表被揭开后,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就显得不再那么令人生畏。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学家Anderson也认为,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只是低附加值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加工中心,发达国家才是高附加值和资本密集

型产品的制造中心。

2. 我国进口获取的技术并不是来自技术水平最高(技术原创)的发达国家和地区,而主要来自技术水平不怎么高的东亚 2003年,我国从东盟、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的高技术产品进口占到50%,比从美、日、欧的进口还高出近70亿美元。从我国资本品进口来源的变化也可以发现,1991年,东盟五国(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占我国资本品进口的比重由1.7%提高到1995年的3.47%,2002年上升到11.14%;而同期欧盟12国占我国资本品进口的比例由1991年的22.3%提高到1995年的29.06%后又下降至2002年的17.25%。日本一直是中国资本品最大的进口来源国,但所占比重也由1991年的18.17%上升到1995年的28.87%后也于2002降为22.68%。实证分析表明,资本品的进口可以给东道国带来知识与技术的外溢效应,因此如果东道国的资本品进口一直是来源于那些具有最多知识储备的国家,对经济增长是最为有利的。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其资本品的进口来源地从高知识储备的国家转向低知识储备的国家,进口的资本品主要包含的是些“倒手”或“二手”的技术和设备,由于产品、技术生命周期和设备折旧期的快速缩短,其大量进口自然会延缓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与产权自主创新体系的建立,进而损害经济增长。所以说中国资本品的部分进口从美国、欧盟转到日韩和东盟,对长期经济增长应该说不利的。

3. 我国出口贸易品成本效益率的提高主要不是源自技术进步,而主要来自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 产品要打到国际市场,没有技术上的优势就无从谈起。目前机电产品出口虽占据中国外贸出口的半壁江山,但许多产品的主要核心技术仍掌握在国外厂家手中,大到彩电,小到打火机都需受到国外厂商的专利围剿;也正是由于专利的保护,飞利浦的小小剃须刀在中国能够卖到上千元,一把剃须刀的利润能比得上三、五台中国彩电的利润。有资料统计,在发达国家,知识在经济增长中所占比重已达到70%以上,可在我国,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则高达72%,技术进步仅占28%。而且以贴牌为代表的外贸出口具有技术含量低、自主知识产权匮乏、产品附加值低等特点,是典型的以“量”和“价格”取胜。有人做过测算,一双在中国制作成本为20美元的鞋子,出口到美国后售价为200美元,中间的利润之大令人瞠目,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廉价的劳动力与落后的技术进步。由此造成中国在全球产业结构调整与分工中被锁定在低端环节,只是充当了一个产业链、增值链在体外收益、体内折腾的“循环器”,成了一个“贸”(易)似强大的“虚肿巨人”。

4. 我国贸易部门迅速扩张并没有明显地带动国内非贸易部门的发展 我国在过去的10年中走的是一条贸易主导的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外贸依存度2003年已超过60%。在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下,如果出口拉动的部门扩张能够带动国内产业对进口的增长,那么国际收支就可能维持大体上的平衡。但我国贸易部门在过去10年的扩张与国内经济发展的联系几乎是脱节的。贸易扩张虽然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但是这个影响是局部的和扭曲的。因为中国的贸易扩张主要得益于外商直接投资的超常增长。如前所述,由于外资企业成了中国贸易增长的主要推动者,并且这些外资企业主要是以粗浅加工贸易为主,进口与出口几乎发生在同一部门,贸易部门的扩张与国内其他经济部门的联系就变得不那么紧密了。贸易部门的扩张对国内经济的传导效应并不显著,这表现为过去的10年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几乎就是外资企业集中的地区。如果排除这些地区,其他地区的收入水平仍然还相当低。在一个高增长、高收入的贸易活动主要集中在少数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体内,我们不能指

望人民币的汇率仅仅由这些少数地区的收入水平来决定。在国际收支上,中国积累起来的庞大的外汇盈余正说明了中国整体经济的非均衡增长与产业结构的落后,同时也制造了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巨大幻觉(即“升值泡沫”)。我国的经济增长如果不是局限在外资和贸易部门的话,是不会有能力在国际收支上积累起这么高的外汇盈余的。它表明我国贸易部门的发展和高技术产品出口比重的提升,既不意味着我国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得到了明显升级和优化,似也难以表示我国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综合竞争力得到了明显增强。

5. 伴随着贸易顺差的同时,我国的贸易条件近年来正在不断恶化 商务部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从1993年至2000年,以1995年为基期的中国整体贸易条件指数下降了13%。其中制成品贸易条件下降了14%,初级产品贸易条件下降了2%。2003年出口商品价格指数为104.7,进口商品价格指数为109.7,贸易条件指数为95.4%,低于上年的98.8%。这就是说,我国的出口商品价格相对于进口商品价格的比值在下降,即我国必须出口更多的商品才能换回同样数量的进口商品。从出口方面看,我国外贸出口出现了量增价不增甚至跌价的现象,这是因为一是我国的一般贸易出口产品是以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不仅面临着发展中国家的价格竞争,同时也面临着国内企业的自相残杀;二是加工贸易的出口产品在目前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基本处于产业链的中下游或末端,其产业增值链很短,产品加工深度很浅,产品附加价值很低,而且还面临着跨国公司内部转移价格的掣肘,很难在出口价格上得到提升。再从进口方面看,我国政府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居高不下,特别是重、化工业的生产和投资增长导致原料、能源等初级产品占进口的比重大幅上升。2003年,中国新增的铁矿石进口量占全球新增产量的51%,新增原油消费占全球新增量的35.3%。本来初级产品的国际价格近年来涨幅就大大高于制造业产品的价格,我国进口需求的上升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际原材料的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既意味着大量物质财富和生活福利的净分流,损害了我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也表明我国的外贸增长方式仍然是粗放。在原料、能源品进口增长高预期的大背景下,只通过多出口,才能以“量”而不是以“质”创汇,更不是以“质”创效益。

6. 我国的出口增长和贸易顺差是以大量低效率的资源利用和环境破坏为代价的 随着我国出口的不断增长,我国对包括能源在内的初级产品的依赖性需求也越来越大,这从国际收支表中的初级产品贸易持续逆差可以发现。我国石油消耗量已居世界第二位,占世界消耗量的7%,钢材占1/4,水泥占50%,煤炭占35%,发电量占13%。特别是原油需求在过去的两年中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大大超过发达国家年平均3%的增长速度。2003年,我国原油、铁矿砂、氧化铝进口依赖度高达38%~48%。由于我国油、电等能源价格受政府管制或干预,没有充分反映供求关系的变化,使得人为扭曲的价格降低了重、化工业的投资和生产成本,在某种程度上又鼓励了这些部门的投资扩张和对能源资源的需求,加剧了我国能源资源日益紧缺状况。在某些重要原料和能源品高度依赖进口的同时,我国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却很低(国际经济界把这种超消耗、超投入、超污染而低产出的经济称为“超负荷经济”或“超铺张经济”)。目前,我国能源的利用效率为30%左右,比发达国家低近10个百分点,是美国的大约六到十分之一,是日本的大约十六到二十分之一。虽然近年来我国加大了能源进口的步伐,能源结构也开始发生明显变化,煤炭在常规能源消费中的比例缓慢下降,到2002年已降到66.3%,油气消费结构比例明显上升,达26.1%,电力消费比例增长迅速,达7.6%,但仍然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以煤为主的国家,低效率的煤炭

上海与国际大都市 经济比较与启示

秦淑娟

摘 要: 本文分析了上海经济发展的现状和特点,并把上海与国际大都市经济发展作比较,从比较中得到启示,提出进一步发展上海经济应采取的措施。

关键词: 上海经济; 国际大都市经济; 比较与启示

中图分类号: F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894(2005)03-0010-05

在党中央的正确决策下,上海抓住了20世纪最后的历史性机遇,提出了“一个龙头、四个中心”为核心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发展目标。经过几轮“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大规模、高速度的建设发展,一个新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已粗具雏型,国际大都市的魅力逐步展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上海率先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上海将进一步借鉴国际大都市经济发展的经验,加快建设国际大都市的步伐。

一、上海经济发展的现状和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经济发展迅速提速,并呈现出显著特点。主要表现为:

1. 经济实力显著增强 从1992年至2002年,上海的GDP连续11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年平均增长率为12.5%。人均GDP从1992年的1 114美元增至2002年的5 000美元。

利用和粗放式开采严重破坏了我国的生态环境和已十分紧缺的土地资源。由此可以看到,我国在大量出口的同时,是以牺牲生活和生态环境质量为代价的。据有关部门初步测算,中国每年由于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所造成的生产力以及相关卫生保健方面的损失大约1 700亿美元,如果按2004年中国外贸依存度70%的比重来衡量,中国每年因外贸造成的环境与资源代价大致则是1 190亿美元。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为6 000多亿美元,只需5年的外贸造成的资源与环境代价就可抵消。这也足以说明在高外汇储备下的人民币升值压力是以牺牲和透支国民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而形成的,这笔账是早晚要还的。从这一角度分析人民币升值压力的虚拟性,似乎更令人深思。

(作者单位: 国家外汇管理局)